

邯鄲归秦与赵王城墓域的兴起

段宏振

公元前386年，赵国迁都邯鄲。公元前228年，邯鄲归秦，赵国覆灭。自此至西汉初的数十年间，邯鄲城经历了多次的动荡与毁圮，城邑范围大幅缩减，西南城区的赵王城被改造成墓域。东周至西汉邯鄲城的曲折演进历程，反映在考古学层面亦有着较为明晰的轨迹。

赵邯鄲故城遗址的发现与认识

赵邯鄲故城遗址位于今邯鄲市区。1940年，邯鄲城遗址首次发掘，发掘者认为，城址西南部的赵王城遗址是战国邯鄲城，而城址东北部则属于汉代赵都遗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大规模考古勘探及局部发掘证实，邯鄲城遗址包括隔河相望的两个城区：西南部的赵王城、东北面的大北城。1979年，侯仁之指出赵王城为战国赵都新建之宫城，而大北城是春秋以来的邯鄲城，赵迁邯鄲之后经过扩建和改建，至汉代时为后赵国的宫城。1984年，《赵都邯鄲故城调查报告》发表，其结论与侯仁之的大致相同。自此，战国邯鄲城包括赵王城和大北城的双城形态基本格局，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

赵王城遗址包括三座相连的小城，城内保存有多处夯土台建筑基址，这些建筑遗迹的内涵及性质非常复杂。2009年，我们在《赵都邯鄲城研究》中推定，赵王城遗址的夯土台基址之中可能存在有汉墓。2014年，乐庆森认为赵王城是赵肃侯的寿陵城，亦即将赵王城的宫城性质改为单纯的陵园所在。2016年，赵王城遗址3号夯土台基址试掘，发现空心砖垒砌的台阶及疑似墓葬。2024年，赵王城遗址2号夯土台基址之下发现大墓，据此赵王城为陵园之说似乎得到了考古验证。

然而，赵邯鄲故城遗址多年来积累的考古迹象表明：战国末期前后，赵王城作为都邑功能被废止，大北城回归成为邯鄲城的核心；秦汉时期，赵王城全部被改造成大型墓域，大北城西部被墓域挤占。因此，赵王城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演进轨迹，具有显著落差的阶段性变迁，以及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邯鄲城在战国至汉代巨变的历史进程中，邯鄲归秦不仅是一个关键节点，同时也是赵王城墓域兴起的一个契机。

赵王城墓域年代的推定

2024年，赵王城遗址2号夯土台基址之下，发现中字形竖穴土坑大墓。此后诸多夯土台基址之下，也相继发现大墓。赵王城遗址内墓群的集中发现，引起关于其作为宫城性质的种种质疑。事实上，由于未经发掘，这些大墓的年代及性质尚不清晰，但可以通过相关考古线索进行某种程度的推定。根据赵王城遗址与墓葬的综合情况判断，这些大墓的年代应在东周至汉代的范围之内。如果从理论上进一步分析，赵王城墓域的具体年代，大致应包括以下三个时间段：

其一，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亦即赵王城建城之前的墓葬。若此，墓域性质应属于迁都邯鄲之前赵氏宗族的墓地。但是，此时的赵氏墓域在邻近大北城西郊的百家村一带，而赵王城地域偏居西南，辟为同等墓域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有少量墓葬的存在。

其二，战国中、晚期，即与赵王城同时的墓葬。若此，大墓即属于赵王城建筑群的重要元素，其当类似于中山灵寿城、燕下都等都邑的格局，而赵王城的内涵及布局将要重新认识。

其三，秦汉时期，即赵王城废止之后的墓葬。如此，赵王城遗址与墓域则分属于前后两个时间段的遗存。

以上三个时间段的墓葬，理论上可能各自单独存在，亦可能两个并行或三个同时存在，但第三个时间段墓葬的单独存在，则有着较为坚实的考古学基础。这一推论的实证依据和推证逻辑主要如下：

第一，根据赵王城遗址考古年表，赵王城作为都邑功能废止于战国末期。

考古年表这一节点的主要依据是：赵王城遗址城垣内侧防雨排水设施遗迹表明，城垣使用以战国末期为宜，分前后两大阶段。

前段：战国中期至晚期，为散水台阶使用时期，此时赵王城作为城邑正常营用。后段：战国末期以后，散水台阶因坍塌土覆盖而废弃，代之以使用排水槽道。严格说来，排水槽道铺设于城垣坍塌土缓坡之上，表明城垣的原本功能严重衰落，已近于废弃以至中止，此亦意味着赵王城作为都邑营用已经废止。

第二，赵王城的废止，是墓域兴起的基础，由此城邑原有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战国末期，赵王城废止，其原有都邑功能亦随之彻底转变。赵王城营用的时间与城垣散水台阶时期相应，而墓域的兴起则大致与排水槽道时期相应。换言之，城垣原本功能废止，即意味着城邑营用停止，然后才是墓域的兴起，自此赵王城由城邑性质转为墓域。

第三，赵王城遗址夯土台基址的综合线索显示，其建造年代大多晚于战国末期。

1940年发掘的2号夯土台基址，发现褐色柱础石、走兽柿蒂纹瓦当、米字格空心砖等。2016年试掘的3号夯土台基址，发现米字格空心砖垒砌的台阶、褐色柱础石、变形卷云瓦当等；尤为重要的是，基址南侧平台的铺石层中出有戳印“邯亭”的陶碗残片，此类陶器属于典型的秦器。以上诸多元素的年代，个别可能为战国末期，但大多属于秦至西汉时期。另外，赵王城南侧北张庄至郑家岗一带，分布着“北张庄汉代墓群”，现存十余座带封土的大墓，其应与北面一墙之隔的赵王城墓域存在某种关联，两者或属于同一墓域范畴（图一）。

总之，根据目前所获的考古依据推定，赵王城墓域的主体年代是在战国末期以后，以秦汉之际和西汉时期的大墓为主，但不排除存在少量战国时期的墓葬。

赵王城改造转为墓域的历史背景

赵王城由城邑改造转为墓域，主要源自于历史进程的影响。邯鄲归秦之后，赵王城废止。秦末以后，邯鄲进入后赵国时期，大约与此同时或稍前，赵王城被改造成墓域。因此，邯鄲归秦是赵王城墓域兴起的开始，也是主要历史背景的起点，而后赵国则是墓域兴起的主因。

赵王城废止的原因，除了秦灭赵之外，主要由于城池的毁圮。战国晚期至秦末，邯鄲城经历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破坏：前两次是秦军围攻邯鄲城，第三次是秦末邯鄲战乱。公元前209年，武臣在邯鄲自立为赵王，自此邯鄲进入后赵国时代。秦汉时期的二十余位赵王，以及邯鄲城所遭受的战乱，彻底改变了邯鄲城的格局。大北城城区大幅收缩，城西百家村墓域向四周拓展，向东延伸至城西北隅。赵王城彻底废弃而被改造成墓域，并与城南的郑家岗墓域连在一起（即北张庄汉墓群）。兴建于赵王城旧址之上的墓域，在战国时期的宫殿基址之上建造了大墓，在城垣内侧覆盖原散水台阶的坍塌土斜坡上，修建了替代的排水槽道（图二）。因此，赵王城城垣排水槽道大致与墓域的年代相应，两者的兴起正是赵王城彻底废弃的标志。

赵王城墓域的主体内涵及性质，应与秦末与汉代的后赵国紧密相关。赵王城的废弃是墓域开辟的基础，而后赵国王室宗族则是墓域兴起的主因。秦末及西汉在邯鄲的诸赵王，其死后的墓地所在，大多缺乏文献的记载。赵王张耳、张敖之墓，或在咸阳，或在正定。赵王刘如意、刘友之墓，皆在长安。其余诸赵王之墓，不详其地。秦汉时期邯鄲城周边的城西百家村、城南郑家岗两个大型墓域，应是以后赵国王室贵族为主要成员的墓地，其中或应含有某位赵王。这些后赵国墓域，既是秦汉赵国的重要遗迹，也是东周邯鄲城废弃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赵王城墓域与城南郑家岗墓域的年代相近，两者宏观上或属于同一墓域。很有可能，郑家岗墓域是赵王城墓域向南蔓延拓展的结果，此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最终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南墓域。

甄别与辨识

长期以来，赵王城遗址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城垣及外围，近年开始聚焦于城内夯土台基址群的发掘。由于赵邯鄲城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十分复杂，尤其是东周与汉代遗存经常处于交叠状态，因此，层叠遗迹之间年代与性质的厘清及辨识、原建筑基址与后期墓葬之间复杂关系的甄别及复原等等，无疑需要十分细致而艰苦的考古工作。例如，关于赵王城墓域内的大墓，何者属于择地独立新建，何者是在旧建筑基址之上的改建？墓域兴起之前的赵王城原貌如何？现存夯土台基址包含有怎样的形成轨迹？但由于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的陶器特征十分相似，因此交叠混杂建筑遗迹的清理与辨识，存在着年代与性质判定的较困难。即使发掘一座年代较为明确的大墓，其与墓域及原城邑之间的复杂关系，亦需要进一步辨析与廓清。另外，是否存在建城之前或与城邑同时的大墓？若存在，其与城邑之间属于何种轨迹的时空关系？总之，有关赵王城墓域的许多细节，还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考古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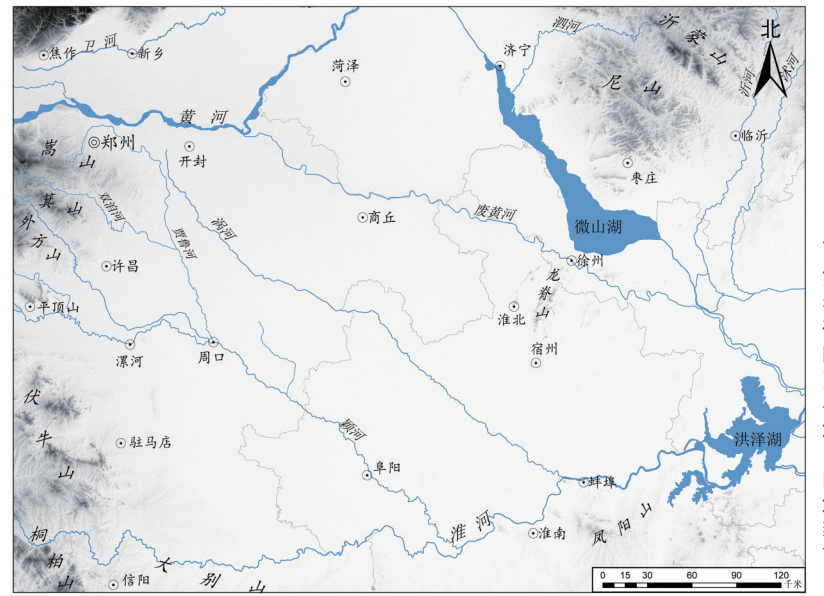
从城邑到墓域，赵王城遗址复杂的演进轨迹，不仅反映了邯鄲都邑功能的变迁，同时也是赵国历史细节的考古学复原。赵邯鄲城遗址还有极大的考古学探索空间，城邑总体建筑格局、各类建筑单元的年代及性质等，均还需要进一步地澄清与分辨。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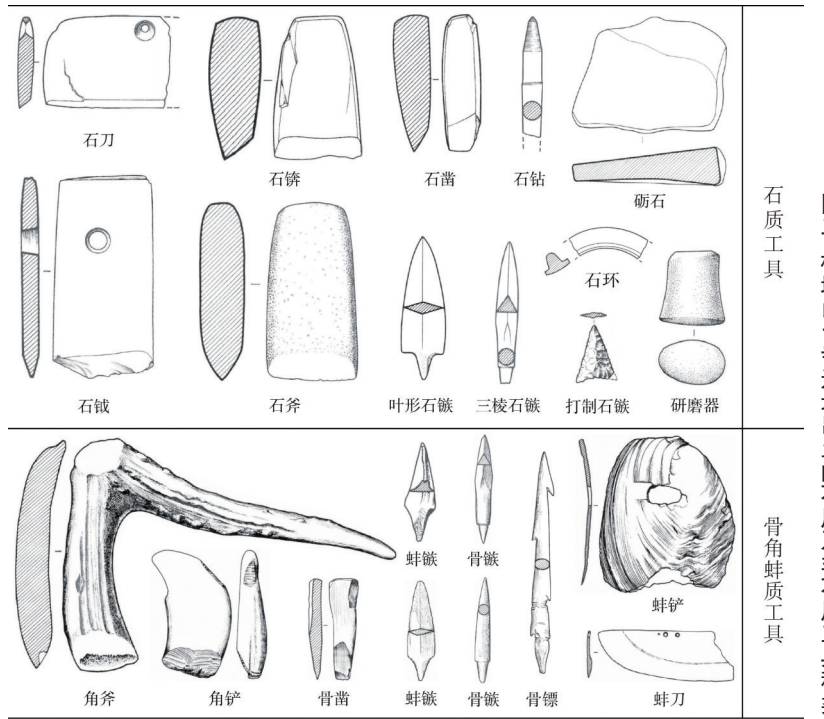
无石成器 川汇四方

——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史前石制品观察

李景山



图一 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地貌简图



图二 栾城山台寺遗址出土的石质及非石质工具种类

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史前时期，这一区域先后分布着虞城马庄第五层遗存、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和尉迟寺类型、造律台文化以及岳石文化。该区域是中原与海岱、江淮等区域文化互动的前沿和重要通道，诸多文化因素在此汇聚，夷夏长期在此交融，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着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

先天的不足

石制品在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石料资源尤其是优质石材是关乎文化兴衰发展的核心资源之一。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属黄淮冲积平原，该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及其支流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其基岩深埋于百米以下的沉积层中，仅有永城芒砀山、宿州龙脊山、徐州云龙山等少数位于边缘地区的石灰岩质低山丘陵。此外，该区域在史前时期属于典型的湖沼堆积地貌，遗址所在的堆地周围被河网和沼泽环绕。这种地貌虽然提供了渔猎之利与水源，但地处下游，加之深厚的淤泥沉积，进一步阻隔了仅有的、通过河远距搬运而来的零星砾石资源，使得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豫东和皖西北等腹地地区，甚至半径近百公里内无任何稳定的山体或基岩出露，石料稀缺程度远超周边区域（图一）。因此，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可称之为史前石料最为缺乏的地区。

石制品的特征

受制于石料的缺乏，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史前石制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出土量不丰富。该区域出土的石制品远少于石料相对丰富的地区，诸遗址均有此特点。例如大汶口文化蒙城尉迟寺遗址1989年至1995年共发掘约70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409件。造律台文化淮阳粮台遗址1979年至1989年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仅105件（不含残块）。这一数量远低于石料富集区的同期遗址。

其次，生产非常薄弱。目前诸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绝大多数为成品，仅个别遗址有少量石锤坯、石刀坯出土，数量少因而产量小。诸遗址与石制品生产相关的初坯、石片、废料和石锤等也较为罕见，同时砾石多为小型，不便于打磨石器。此外，虽然部分遗址存在石锤、石锤等器类改制现象，但这些器类多数硬度较高，改制不易，因此改制现象并不流行。综上，目前苏鲁豫皖地区已发掘的诸遗址其石制品的生产皆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均属于消费型遗址。

再次，充分使用非石质工具。虽然该区域的石制品器类比较齐全，常见器类均有出土，但器类占比并不均衡。诸遗址基本以石斧、砾石、石锤、石锤和石锤作为最主要的石制品种类，合计占比往往在70%以上，而石铲、石刀、石锤等农业工具占比较少。这一现象并非说明农业生产活动不发达，而是该区域因地制宜使用非石质工具所致。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旷野平林中遍布湖沼湿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此地先民广泛使用木器和骨角蚌器替代石质工具。由于埋藏环境不佳，木质工具难以存留，但诸如栾城山台寺（图二）、夏邑清凉山、杞县鹿台岗等遗址均有与石制品数量大致相当的骨角蚌器出土，尤其是石斧、石锤、石锤等数量众多，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石质工具的不足。

最后，多数器类依赖外部输入。鉴于石料缺乏、本地生产薄弱且出土石制品的器形普遍偏小，各器类多依赖外部供给，尤其是石斧、石锤、石锤等无法被其他材质替代的硬质工具，几乎完全来自外地。多源输入格局，使得该区域石制品岩性种类丰富，同一器类的器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同时，石锤、石锤、砾石等器类存在优势岩性和相对集中的器型，暗示可能存在相对稳定的来源渠道。需要明确的是，输入至各遗址的石制品主要为成品，而非石料。

困境与展望

当前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史前研究多聚焦于陶器、

墓葬、大型聚落或城址，而石制品在发掘和整理中往往被忽视，现有认识多停留于数量少、器形变化小的初步印象，其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区域的石制品研究不仅需要岩性鉴定、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等多学科参与，而且由于单一遗址出土数量有限、信息不足，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系统地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分析研究，其研究难度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然而正因如此，这一领域尚存较大的学术空白，其潜在价值可在适应策略、区域互动、社会演进等层面进行深入挖掘。

其一，研究资源困境下人类适应策略的珍贵标本。石制品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原料短缺必然对多项生产活动产生影响。面对“无石成器”的困境，该地区先民将实践主义与资源环境相结合，广泛利用其他材质的工具并积极寻求外部输入。正是通过这套集“替代+输入”于一体的复合型资源利用策略，维持了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形成了该区域独具特色的石制品面貌，集中体现了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

其二，复原区域互动的流通网络。流通网络的运转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区域资源互补与协作能力。石制品以成品的形式输入该区域的诸遗址，则输入地必然与生产地产生密切联系。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这些河流可作为重要的运输通道，从而构建起细密的流通网络。由于石制品来源地分散且总量有限，因此其流通模式倾向于开放式的小规模零散交换或工匠人群携带，而非官方组织的集体行为。政治性的资源管控并不明显，流通网络呈现出较强的自由贸易性质。

石制品所代表的物质输入往往伴随着人群的流动、技术的传播、贸易的开展，是区域间文化互动的“物证”。开放式的流通网络赋予了这一区域较强的文化活力，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和造律台文化皆曾呈现川汇四方、多元融合的景象。

其三，理解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史前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已具备发达的流通网络和广阔的文化互动，然而该区域为何未能突破发展瓶颈，进而演化出早期国家？从石制品生产流通角度或可提供部分启示。一方面，石制品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生产技术的替代与转移，虽使该地区先民从石器制作中解放出来，得以更专注于农业、建筑或其他手工业，但同时导致其缺乏应对危机的技术储备。重要生产工具的获取长期受制于外部环境，严重削弱了自给能力，一旦供应链中断，聚落的运转将面临严重危机，凸显了消费型聚落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史前遗址普遍规模小、内部缺乏复杂分工和等级制度，社会权力基础薄弱。反映在石制品流通领域，其分散和流动的输入模式表明，社会权力结构更倾向于“协商式”或“服务式”，难以催生一个能够垄断重要资源与流通网络的强权核心，从而制约了社会向更高级别的演进。这与早期国家“垄断-控制”型模式有显著不同，例如拥有一个以资源获取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二里头遗址能够步入早期国家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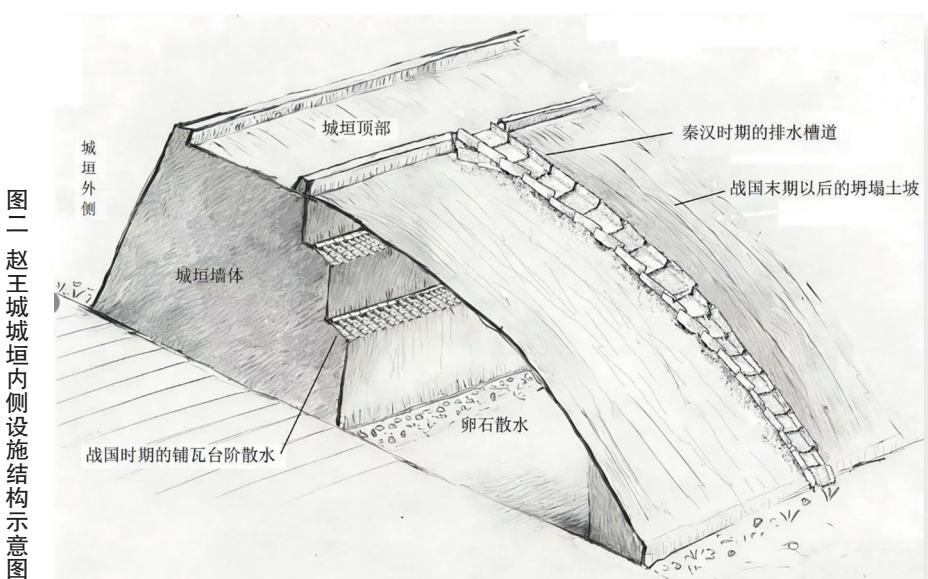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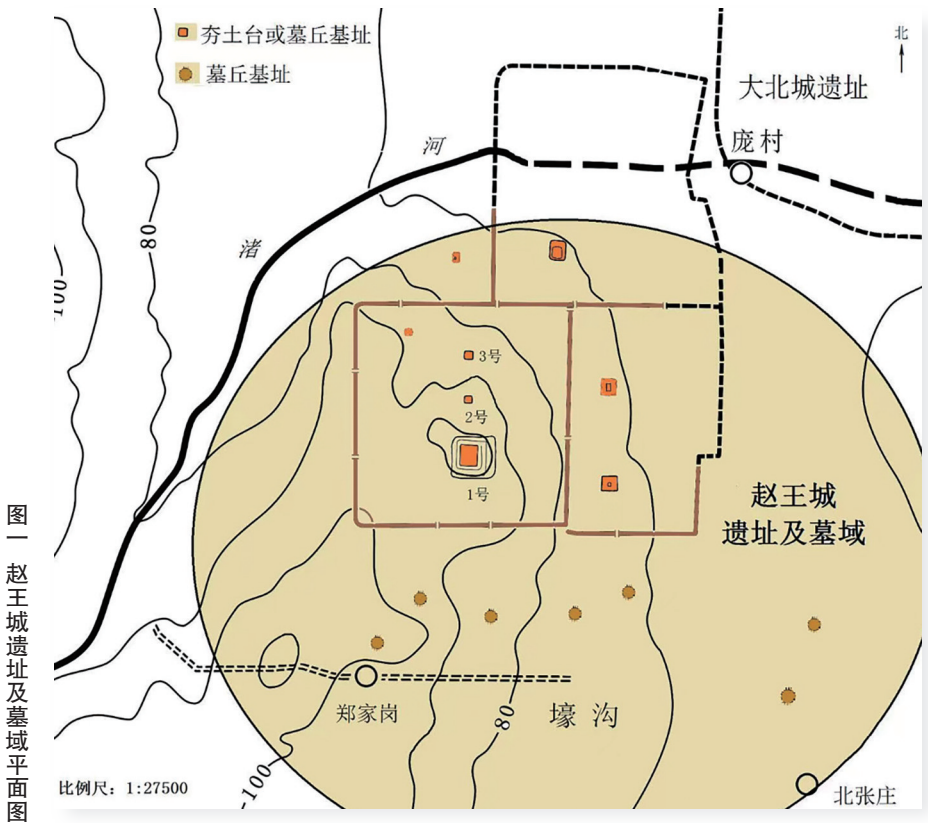
结语

手工业考古、文化交流互动与早期国家形成，均为当前考古学所关注的热点。在此学术背景之下，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石制品研究，恰恰处于三者的交汇点上。这些“不起眼”的石制品，不仅是先民在资源困境中谋求生存的智慧见证，更是复原区域互动网络、理解早期社会发展的特殊窗口。

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近乎空白。原料来源不明、流通路径不清、区域比较缺失……诸多基础问题尚待解决。我们呼吁重视这片学术沃土，以多学科手段系统推进，让沉默的石器讲述完整的史前故事。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丹浙流域出土新石器时代石制品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5XWH1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版责编：冯朝晖 张 宸 丁淑娟



图二 赵王城城垣内侧排水设施结构示意图